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四十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七月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6印张 2插页 165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统一书号: 11072·210

定价: 1.55元

目 录

我是沙场过客——北伐战争回忆之二……李汉魂 (1)

李大钊与天津 刘民山 (31)

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者刘清扬 胡霭立 鲁开荣 (62)

天津早期妇女运动回忆点滴 江韵清 (77)

回忆我的母亲江韵清 张世俊 (81)

先父徐树铮将军事略 徐 樱 (87)

先父徐树铮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一封信 徐 樱 (140)

徐树铮入蒙纪实 翁之惠 (145)

忆语随笔 曾毓隽 (160)

辛亥革命以来我国币制的变迁 包培之 (169)

天津近代货币演变概述 谢鹤声 刘嘉琛 (176)

北京铜元券发行机构及发行概况 尚绶珊 (187)

浅谈天津钱业的拨码 刘嘉琛 谢鹤声 (193)

记邮政储金汇业局 熊承德 (197)

我在旧社会当警察的见闻 李宝荣 (209)

· 价 白 ·

天津《妇女日报》	葛培林 (86)
唐生智投靠蒋介石的经过	陈文会 (139)
少女时代的刘清扬	方 忆 (175)
来函照登	陈洪明 (192)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36—40辑总目录	(231)

我是沙场过客

——北伐战争回忆之二

李 汉 魂

一、武昌围城与奉命援赣之际的小闹剧

北伐军攻下武昌城，是战术上的胜利，同时也更属于战略上的胜利。

准确地计算时间，我军是以1926年8月30日攻克贺胜桥，而正式开始向武昌城进军则是8月31日。当10月10日以历史性的偶合，北伐军的雄师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15年之后，再一次使这名城刮垢磨光，重登历史舞台。进军过程一共是40天。

我们最初是采取强攻手段，以不惜牺牲的姿态来抢城的，但当时的战争仍只是一种点、线、面的攻守概念，立体战争（即配合空中的攻击手段）还刚在萌芽，武昌的城坚堑深，正是历史上盛称的所谓金城汤池。徒然以血肉之躯架梯攀缘，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实质上犯不着向敌人居高临下的枪口下押注，所以攻城司令部曾下令改弦易辙，采取全面封锁的战术代替强攻。同时在第八军的呼应配合下，他们已经占领了隔江的汉阳和汉口，鼎足而立的武汉三镇整体，两足俱折，武昌城在敌军的战略意义上再也不是中流砥柱，眼见就要宝鼎倾颓。北

伐军的封锁，不但切断了敌人的邮电交通，而且切断了敌人的弹械来源，加深了城中军队活动的瘫痪，其中一点为北伐军所最不忍的是封锁措施使整个武昌城的粮源也不继了。它当然关系到残敌的本身，却也同时陷城内数十万居民于饥谨，因此，攻城司令部曾多次号召残敌投降，庶免祸延百姓。北伐军总部行营白崇禧参谋长也指示航空队派遣飞机飞临武昌上空，撒放传单，敦促敌人放下武器，向革命部队输诚，缓解满城人民绝粮的燃眉之急。敌人中的死硬狡猾分子也曾卖弄过玄虚，派使者要价还价地谈判；另一部分较为开明的也有凛于大义，确认前途而主动与我军洽商。我军在不懈的封锁、警戒，积极挖道，耐心接触，最大的希望是让人民群众在这场残酷战争中把受害和损失减至最低限度。

如此的相持，一直延续了四十个昼夜。

也就是“鼎折二足”、武昌围城之日，吴佩孚勾结上孙传芳。孙传芳的野心原就不小，早已磨刀霍霍，吴佩孚的秋波一送，他的“五省联军”也就更开始做着“饮马洞庭，击楫扬子”的幻梦。从1926年9月初旬至下旬，孙传芳大军入赣，而且把他的精锐谢鸿勋、卢香亭、杨震东、邓如琢等部部署在江西西境沿湘赣边界的修水、铜鼓、萍乡、莲花一带，准备随时向湘东出击，威胁北伐军军运大动脉，甚至袭断北伐军后路。另外，孙传芳还派遣陈调元、马登瀛率部自九江乘军舰挂日本旗溯江西上袭鄂城以解武昌之围，攻大冶逼咸宁以拊北伐军之背。在战略上，这也是孙吴的大联合，一齐在几个省区的军事大运动。北伐军面临的考验是严峻的，不容许有少许的失落差池，总司令部既未拿下武昌，又要统筹湘鄂豫进军后新局面的维持与巩固，更必须无懈可击地使孙传芳部队找不到北伐军的弱点和可

乘之机，这一个要害的关键，端在战略的远见，兵法上的“有力进攻为最佳防守”是一条黄金规律，因此总部早就利用孙军布置未竣、阵脚未稳，发制机先，把原部署在全军战斗序列右翼的谭延闿第二军、朱培德的第三军，由醴陵基地分头突击赣境萍乡；又把原已集中在湖北咸宁的中央总预备队程潜的第六军调回通城，向赣境修水堵截。而蒋介石总司令亲率第一军的第二师刘峙部，由湖北移师东向，直指江西，会合有关部队，展开对孙传芳的全面扫荡。

武昌围城之战正酣，江西方面的敌我动态显示出吴佩孚与孙传芳的勾结，时时在形成一股暗流。虽然北伐大军雷霆万钧的威力使湘鄂豫三省残敌望风披靡，可是江西境内孙传芳配合吴佩孚的蠢动，不能不说是给予北伐军以很大的掣肘，正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总司令部从全局观点着眼，显然也需要急取武昌，然后把铁拳全力挥向鄂赣、湘赣的东线。

我十二师本来在围攻武昌城的战斗任务中是攻击通湘门至宾阳门一带，而且张发奎师长已下达了我三十六团及独立团各自负责一段阵地，三十五团则为军部的总预备队。自攻城司令部因兼司令李宗仁的第七军已为堵截陈调元、马登瀛，悉数急调鄂城、大冶，攻城司令亦改由我四军陈可钰副军长兼充，并且把强攻改为对武昌城的全面封锁，因此9月梢至10月初间，沿线战况一直沉寂。

困守危城的残敌似乎是迫切等候着东线的孙传芳部队给他们解围的，所以每次刘玉春、陈嘉谟派遣的和谈使者总在最关键的问题上故弄玄虚。我北伐大军固然已在东线全面有效地堵截了孙传芳部队的西进，但是，我们也根据各方消息，得知江西方面我东线大军对南昌的攻略是得而复失，损兵折将，情况

严重，尤其是孙军有一个混成旅沿长江西上，在石灰窑一带乘我江防薄弱环节成功登岸，其企图当然在威胁我后方，达成纾解武昌守敌之困。

武昌的负隅之“虎”，到底是内外消息隔绝的，封锁战略在这方面收到效用。我们围城的部队当然知道鄂赣战事吃紧，南昌方面也出现了城破后再为敌人反噬；我们还深知北伐军处在两个战场，战线距离拉得太阔，军需粮秣的补给困难。但可能在武昌困守和豫南遥远的敌人不能象我们自己这样了如指掌，是以我们起码还处于优势。

征赣之师，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力量投入，在10月1日，我三十六团忽然得到一个单独出发江西的消息，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有一个去为革命事业出力的机会，纵使龙潭虎穴，我们只为一句豪语：“让我们把它夷平！”

我三十六团果于10月2日出发，是循原来进军之路折回纸坊、山坡等小镇，命令是叫我们在金牛集中。我们从来是没有对命令表示过怀疑的，也就是说服从命令本身就是作为一个军人的天职，或者说作为一个军事集体的基本信条。本来唐生智的第八军早在北伐军总司令部策划进攻武汉时，是由总部部署为左纵队的主力，唐生智军长被指定为左纵队司令兼前敌总指挥，第八军除留下一部分作为攻城部队暂归李宗仁军长兼攻城司令节制外，其大部分则分配在名符其实的环绕武汉三镇左翼执行任务，目的是绕出金口强渡长江抢占汉阳。诚然，汉阳的攻略成功是属于第八军的军功，而且促成武昌城的陷于孤立，也与第八军的攻取汉阳有着直接关系。至于武昌围城部队中，因为第八军所留一部分既已拨属攻城司令指挥，李宗仁的第七军复以援赣开拔东线，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递补攻城司令，所

有不同番号的围城队伍当然亦只能在统一指挥之下。大敌当前不容有任何龃龉，可是眼看着武昌危城指日可破，有一股小暗浪却轻轻冲击了我们明眼人的纯洁心灵。

第四军所属的各师各团以至最基层，自编组、训练、集结直到分别奉令进入战斗序列，一贯是不辞艰险、舍己奉公，而且遇困难就上，遇光荣就让，彼此团结精诚，指挥遂能如臂使指。最初北伐军总动员令未颁，独立团叶挺部即先期开赴湘东南的安仁、攸县，驰援唐生智部队所受赵恒惕的南下军事压迫，以后十师与十二师在株（州）、醴（陵）、浏（阳）、平（江）连续胜利，我四军也毫不居功，偶有挫折亦绝不诿过，这种风范，实在无忝于以后受到江汉群众锡以“铁军”嘉名，并且为人民所永恒怀念。偏偏在围城的白热阶段，十二师中的我三十六团忽然奉命离开攻城战斗岗位，折向金牛集中，第八军已早有两个营在我们的攻城防地接防，及至我团到达金牛，金牛也同样先有第八军第一师的第一团在等候与我三十六团交接防地，他们是开回武昌镇填补我们攻城位置的空缺。换防后该师即通报说：“一、阳新现有敌军两千余，大冶有敌军千余；二、第七军已由瑞昌向九江挺进，南昌、九江在激战中；三、第八军正由鄂城向石灰窑（即大冶向长江的出口）、黄石港敌军施加压力。”基于没有其他消息可供勘对，我三十六团只好在金牛警戒候命。

及至10月5日，我十二师师部及三十五团亦开抵金牛，这一次的移动到底意味着什么？

至于赣境战报6日才来，南昌方面，北伐军已大获全胜；九江方面，第七军亦所战皆捷，那么，我十二师的任务是什么呢？

直到10月7日，总司令部有电报，指明第四军任何部队非有总司令命令不得离开武昌城前线，故此陈副军长兼攻城司令就有急电给我十二师，飭令凡已由原攻城战斗序列撤出的，应火速赶回原指定攻城任务所担负的防地，这又一次使我师的人增加了困扰，我们怎样去组织交通运输工具？我们怎样向当地群众交代？我们又怎样考虑面对阳新、大冶一带残敌在我们布防和警戒后忽然又出现真空的新问题？但命令既已下达，信赖和服从就是我们的最高选择，急如星火的我们抢分夺秒向武昌城前线奔赴。途中，道路传闻武昌困敌已开城出降，负责接洽而最后逼使敌人达成协议的是第八军。当然，八军军长唐生智是前敌总指挥，从前敌总指挥的涵义说，攻城司令虽在单对围城时有它专门的责任，它仍然该受前敌总指挥的节制，我师是在执行封锁、战况沉寂之际从通湘门撤下来把防务交给八军的两个营，而且，我们明明知道当“封锁战”正在发挥效力，城中困敌也朝不保夕地酝酿着求和谈判，甚至派遣密使接洽多次，俱无成议，偏偏在我十二师离开原防之后，第八军就能具有如此威力解决了三十多天未决的问题？驰返原防的急行军路上，一个一个疑团，浮荡在我三十六团、三十五团以及师部成员的胸臆，脚迹已经踏出来就无须回顾，胸臆不解之结使我们对革命的远景蒙上一层淡淡的忧虑。本来嘛，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困敌投降以至接洽成熟往往系于时势，不受哪一层级、哪一个作战单位。能够促使敌人输诚、或者由谁来负责受降，在整个革命利益衡量，都是一样，何况彼此根株相连。我军我师我团亦绝无争功夺名的意识，不过深入一些去思考。最初攻城部队包括李宗仁的第七军、刘峙的第一军第一师、陈可钰副军长指

挥的第四军，第八军除了派去抢攻汉阳剩下较少的一部，及后李宗仁、刘峙等部都以赣境吃紧，由总司令部调赴东线去了，第四军成为了武昌这方面围城主力，敌人不降于我四军而降于第八军，其中使我们最迷惘的是莫非我们见嫉于友军么？我们在许多硬仗中作了一些革命军人应该做的事，莫非就为友军所误解成争功吗？我们在围城的前沿上当战争沉寂之际忽然奉调到一个并不吃重的防地到底是为什么？总司令部严申本军任何队伍非有总司令部命令不许离开又为的是什么？攻城司令对于指挥围城队伍不能以专责成的原因又是为了什么？

陈副军长兼攻城司令饶有大将风度，当我师回驻原防，除获得温慰外，更叮咛对于每一个行动必须树立全局观点，服从战略需要，不能稍存猜忖与怀疑。显然，亦只有这样才可以消弭一切不利因素，才可以使我们北伐的兄弟部队之间保持最良好的团结融洽关系，“师克在和”，我们充分了解了主帅的高瞻远瞩。因为当我们重归战斗序列时，我们知道了第八军曾在与城中吴俊卿第三师洽谈后曾试图进城不得要领而复出。对于这一历史秘密，今天由我补叙出来，我并不从任何恩怨的观点出发，到底天下之间是没有什么永远秘密的，我只觉得，设使在一场兄弟阋墙的可能性在萌芽，而一个胸襟广阔的主帅能使危机化解于无形，那才是我们在战略上的重大胜利！

这应该具有历史上永恒的意义，我为一位大将风度的人物歌颂，也为此而提供世人一面现实的镜子。

然而，毕竟我们围城大军终究由陈副军长兼攻城司令率领进城了，那一个激动的场面已见诸前述。我在这里所以不惮烦地补充，主要在阐明我第四军的观点和立场，让史家有比较可靠的修史资料。

二、吴佩孚的“秋波”，孙传芳的“梦幻”

吴佩孚在武汉一战中是部署了重兵，其希望确保鄂豫地盘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当武昌围城之日，吴佩孚已预感其独霸中原的幻想已濒黄粱梦破，形势逼人，使他不能不考虑到必须找“续命汤”来苟延他的末日，串连军阀、勾结列强的两张王牌他都打出来了。

上面已经提过，北伐军沿粤汉线以四、七、八军为主力的攻打武昌部队，在40天的围城未下时，一直以五省联军总司令自封的“土皇帝”孙传芳，也正虎视眈眈，屡图向湘鄂染指。其实，他也并不是没估计到北伐军的右翼大军的铁拳已经挥向福建和江西，将引致什么后果，但目光如豆的军阀从来是高估自己而低估人民，眼睛是只看见鼻尖的，尤其是吴佩孚那么秋波一送，啖以厚饵，孙传芳野心益炽，他还恃着帝国主义可以为他撑腰，他哪有不磨刀霍霍、凶相毕露地在这关键时刻以逞一试呢？北伐军自进军以来战略上的敏感度很高，部署也很少被动，所以赣境的孙传芳部队一开始集结、移动，北伐军总部原率领的第二军、第六军和第一军的第一师等部队，便直接由蒋介石、白崇禧指挥东向。

孙传芳的所谓“五省联军”原在1926年9月间就已经分遣谢鸿勋、杨震东、邓如琢等部分布于赣西修水、铜鼓、萍乡、莲花一带着意向湘赣、鄂赣边境窥伺，这时，更明目张胆动作起来。“解武昌之围”是向吴佩孚卖人情，“抢占湘鄂地盘”是他的“基本大业”。

第七军李宗仁部是在武昌围城之战方酣抽赴鄂城、大冶迎

击溯江而上的孙传芳所派遣的西犯部队，其实当武昌城在双十节被攻下后，第七军已扫荡了黄石港、富池口、石灰窑等处，越过瑞昌进击德安了；至于蒋介石总司令指挥的部队也由醴陵出萍乡，由通城出修水，把赣敌各个击破，直抢南昌城。

我四军在进驻武昌城按照攻城司令部分配，执行维持秩序、巩固治安、协助民众清理危房、整顿残秽、恢复交通、鼓励市廛复业、督饬学校开课、工厂复工，这样的百般丛胜，革命军正面临着许多迫切的问题，尤其是一牵涉到前线部队的给养、军实支需，我们“仁者之师”的“解民倒悬”的号召正经历着严峻的考验。以我当时的观察，由于围城日久，炮火毁伤，民房铺户多成焦土，百姓亡命归来，无所栖止，不少乞丐街头或借颓垣片瓦以蔽风日，触目凄凉景象，心辄戚然！更看到此次部队入城，因指挥系统稍涉庞杂，间有一些游杂队伍借端骚扰，已据报有不明番号“官兵”做出了不法事件多起。当时上报到攻城司令部、前敌总指挥部，急待处理，后获北伐军总部行营白崇禧参谋长电令：如有再敢破坏军纪、损害民众利益、直接间接影响革命军令誉的，只要查有实据，攻城司令部仍负责全权作出军法审判。因此歪风才得刹住。我十二师各部除执行任务外，并加紧整训，团、营单位的工作几乎都忙碌到排不开来。我当时曾向团长和师长都强调过军事行动必须要配合政治工作，武昌一战虽然我北伐军取得胜利了，但贺胜桥之役以后，我曾目击了革命军所开出的“支票”在民众面前并非百分之百的兑现。武昌城既下，居然还出现了军纪上未尽如人意的的事情，姑不论责任究将谁属，其影响自不容忽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此我于出发援赣前曾在军中大声疾呼者。

1926年10月21日，我四军奉命以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第三十

五团、第三十六团、炮兵营、直属部队及第十师之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第三十团的第二营等队伍，由武昌乘轮船东下。我们的东征援赣开始了。

在此之前，蒋介石以北伐军统帅亲自疾趋江西前线督战，总司令行营也从湖北移署南昌附近，而且第二次围攻南昌的战役也在十月初旬便展开。第一军的第二师是主攻部队，其余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也分别向萍乡、修水出击。孙传芳的军队并不比吴佩孚的军队出色到哪里（注），北伐军的破竹之势，已使赣敌疲于应付，孙传芳在连续失利中，显然争取不到主动，吴佩孚对他的“香饵”这次成为“毒饵”。领受过北伐军铁拳的孙传芳此时也只好让各路的部队龟缩不动，并且死力保住南浔线，沿铁路布防。二十年代，铁路的交通运输到底还是比较先进的，不象革命军凭一双脚板走遍天涯，所以当时孙传芳唯一可恃的仍然是南浔铁路。蒋介石总司令大概已估计到武昌的解决已经是指日可待，对唐生智的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擅令八军某部接替我师我团在武昌城下的攻击位置、并将我团及三十五团调赴金牛一带，认为属于指挥不当，因此严令非有总部命令，围城部队不许抽调。这一做法，在战略上是使能集中力量迅速攻拔武昌后，解除了援赣战事的西顾之忧，而北伐军内部必须团结，消弭了一些不必要的磨擦，以我当日作为一个团级佐属来说，我这种体会，大概能代表了广大忠诚的北伐将士的心声的。

拥有交通工具，在行军的速度上当然比靠双脚步行为优越了。自从从军讨贼，由粤入湘，由湘进鄂，我四军虽战绩勉强告慰国人，斩将搴旗，关山飞渡，但取义成仁的烈士，血洒疆场的已经为数不少，所以培训补充，团一级的责任特别重大，

因为“团”往往是被视为一个可以独立作战的单位。我以团幕僚长的身份，对兵员、对粮糈、对交通运输、对筹划配合地方政情、对争取民众归心，都曾与兄弟部队同僚，花尽心力，此次东征援赣，亦努力为减轻部队移动的疲劳，蓄积新发于硎的锐气，求得有交通工具运转的行军路上，让战斗人员都能节省一点体力。三十五团是此次张发奎师长所指挥部队的先遣队伍，先数日已出发鄂城，我们是属于后续部队，按次序我团须随师部一齐开拔。

开拔之际，连续接获福建方面的战报和浙、皖方面有向革命军靠拢的消息。大概知道北伐军在闽军事迭获胜利，浙江的督军夏超亦宣布独立。皖军与北伐军有了默契，这对于整个赣局的底定，已不待蓍龟而判明。我军过鄂城，得确讯：大江南岸鄂境已无敌踪，第七军则由箬溪进至鞋山、武穴，现正在交战中，我三十五团亦已向大冶推进。

鄂城地方不大，与黄州隔河相望，宋朝苏轼误以为三国当年赤壁鏖兵即在此；由于军中暇豫，离前线尚远，未有交绥，况此夕月明风静，我也不计较历史上此有数之大战役到底果是就在此一赤壁，既然苏子曾与客泛舟同游，那末我也拉了三两团部中人，且向江边遥望，山川相缪，郁乎苍苍，要是当年曹孟德困于周郎的果是此地，则今日我们挥军北伐，讨军阀而锄列强，凭吊千古战场，似亦剑气冲云、角声吹月。一时兴发，吟了七绝六首，当时剑泉在三十五团已驰赴大冶，种石则调军部留武昌，酬唱无人，颇增寂寥之感。诗，忆录于此志念。

(一)

大江东去萃群英，瑜亮同功一炬成。

未殄渠魁空复众，江流有恨带悲声。

(二)

烽火今宵似曩时，月华无恙世情移。
可怜一样无依鹊，难向江南觅旧枝。

(三)

天下英雄漫自夸，棋争一着便全差。
无端昨夜东风急，堪笑狂夫意态奢。

(四)

一夜狂飙卷六军，千年赤焰尚留痕。
汉家火德今犹旺，好向山前认国魂。

(五)

黄花晚节古同欤，身后碑铭未可侵。
魏武岂容称汉将，春秋笔法重诛心！

(六)

赤壁临江自古今，寄身天地任浮沉。
滔滔未了刀兵劫，愁对空山独自吟。

(注)：根据我当年(1926年10月11日)的军中日记，摘录一段如下：

我军攻下武昌，敌守将刘玉春为剑泉所逮获送攻城司令部，据参与讯问的军法人员纪录：“刘玉春谈此次北军之败，实为吴佩孚始料不及；向来南北打仗，南军绝不能越过汀泗桥，竟料不到广东军如此厉害；贺胜桥一役我三团人死折了两团，连长只剩得四个；那个阵地是参谋长陈冲（作者加注：也是保定同学，昔共芸窗，今各异调，堪发一叹！）所选。地太荫蔽，我一见便欲退后，但恐失士气，未果；我之部属实很用命，所以虽只剩一个团的人员为基础，尚能死守武昌四十日，不料竟为吴俊卿所卖！至于武昌之不能守到底，

我早看到，力主退守汉阳，但吴子玉（作者加注：吴佩孚别字子玉）不听，我既经受命，只以死殉。今日得此结果，原无话说，但一班部既经输诚缴械，尚望加以保全。……”

刘玉春又评论革命军说：“南军能人自为战，活泼勇敢，实为北军所不及，尤以大包抄及长途追击，更足令人佩服。……张作霖的军队亦不弱，孙传芳的军队日子太老，实不能战。……”

以南军如此勇锐，倘能认真研究北军的利钝，所到处顺应舆情，不难统一中国。……

刘玉春言谈侃侃，绝无畏怯，且中间颇多中肯之语，亦北方武人之翘楚也。”

此处刘玉春所评孙传芳部队作战能力，不失为的论，故引此为注。——作者

三、偏师倘许下浔阳 ——四军对赣战的战略设想

自鄂城出发，过石灰窑。

途次我不但协助团长鼓舞士气，整饬军纪，极力诱导军队与民众建立鱼水情，而且每每一值闲暇即与团部成员及各营长慎研作战计划，尤其注意考察各所过地区的工商业状况及农业生产力及其布局；因为在石灰窑还要候车，所以我有机会理解了大冶铁矿和石灰窑的土敏土厂情况。大冶铁矿借石灰窑作为成品的出口转运站，以战事关系，复因营业不景，铁矿停工已达数月，建厂在前清时代，系借日本款项五千万元始得开办，停工后除留少数工人看厂外，皆已遣散，但仍须每月缴付息金数十万元，支付工资亦须数万元，如何能在没有生产的情况下